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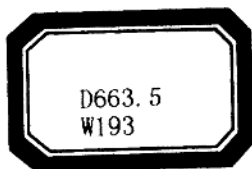


党的 知识分子 方略

● 王 桂 兰 等著

● 红 旗 出 版 社

演 进



河南师范大学出版基金资助

党的知识分子 方略演进

王桂兰等 著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党的知识分子方略演进/王桂兰等著.

—北京:红旗出版社,2004.9

ISBN 7-5051-1021-7

I. 党…

II. 王…

III. 知识分子政策—研究—中国

IV. D6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6471 号

党的知识分子方略演进

王桂兰 等著

责任编辑:翁世茵 封面设计:冯柯

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100727 地址:北京市沙滩北街2号

E-mail: hqchs@publica.bj.cninfo.net

编辑部:64071348 发行部:64037154

印刷:廊坊市百花印刷有限公司

2004年9月北京第1版 2004年9月河北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267千字

ISBN 7-5051-1021-7

定价:21.80元

序 言

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一个社会阶层。但它又不是一个普通的社会阶层,而是一个对社会产生举足轻重影响的、重要的社会阶层。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李大钊曾有句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历史使命。

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因素,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不仅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学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在某种意义上既是一个学术话题,又是一个政治话题。也许正由于其政治话题的敏感性,长期以来,关注这个问题的人不少,而致力于研究该问题的人并不很多。王桂兰同志,作为一个青年学者,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一个党史工作者的使命感,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注知识分子问题,不断地积累资料,曾先后发表过《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全面建设十年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建国初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以及《市场经济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及其审视》等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带领课题组,申报并完成了《争取·改造·培养·依靠——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研究》这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为该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通读书稿,一个突出的印象是该书提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研究体系,即用“争取·改造·培养·依靠”八个字将党建立80多年来的知识分子政策轨迹完整地勾画出来,确立

了自己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学术研究框架,宏观系统地表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历史特征和递进层次,填补了以往缺乏这方面概括的空白。第二个深刻印象是该书采用了多角度的研究方法。即不仅从政治学角度,而且从社会学角度,不仅从党及革命与建设事业对知识分子的需要角度,而且从知识分子为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和实现个人自身价值从而产生对党及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事业的依赖角度,进行了双向的探讨和论证,并通过比较全面、翔实的分析论证,使党在每一阶段的方略制定都建立在服务历史任务需要与知识分子自身能动性的结合点上,叙述客观、自然、实事求是,使了解和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具有了更科学的基础。第三个印象是比较客观地分析了党曾经在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发生的失误,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其发生的主、客观原因,为今后避免重蹈覆辙提供了借鉴。第四个印象是资料翔实,特别是历史较为久远的难以找寻的文字资料,也搜集了一些,为有兴趣的学者提供了不少方便。这也说明著者治学的扎实、勤奋、细心,没有浮躁心理,这一点十分难能可贵。诚然,该书也还存在不足,其一是对改造和培养方面依据的论证还不够充分;其二是对经典论述的分析还不够深入。尽管如此,但瑕不掩瑜,该书对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研究的系统性、宏观性的学术贡献和对正确理解、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现实借鉴意义则是不容置疑的。

谨以为序,愿为学的知识者因此而找准自己的社会坐标,激励其立业与报国之志;愿为政的知识者因此而客观地认识当代知识分子在中华民族振兴大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史为鉴,最大限度地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献身祖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建功立业。

石仲泉

2004年5月 于北京

目 录

序 言	(1)
绪 论	(1)
一、中国知识分子的界定	(4)
(一) 中国知识分子的由来	(4)
(二) 中国知识分子的界定	(8)
二、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概述	(12)
(一) 政治学角度的二者关系	(13)
(二) 社会学角度的二者关系	(15)
三、党的知识分子方略发展沿革的轨迹	(17)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争取方略	(17)
(二) 建国初期的改造方略	(18)
(三) 新中国 50 余年的培养方略	(19)
(四) 经济建设时期的依靠方略	(20)
第一篇 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以争取为主旋律的方略	(23)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知识分子实行争取方略 的依据	(25)
(一) 党建立反帝反封建革命联盟的需要是实行争取 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25)
(二) 党对中国知识分子状况及其在革命中地位作 用的认识是争取方略制定的主要依据	(26)

(三) 中国知识分子实现救国愿望、施展个人才华 是其接受争取的内在动因	(56)
二、实施争取的途径与措施	(63)
(一) 思想宣传	(64)
(二) 组织吸收	(76)
(三) 放手使用	(77)
(四) 生活优待	(82)
三、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85)
(一) 思想理论宣传方面的主力作用	(86)
(二) 文化教育与文化艺术方面的重大作用	(94)
(三) 科技生产方面的突出作用	(103)
(四) 根据地医疗卫生事业中的骨干作用	(110)
(五) 国统区政治斗争中的独特作用	(117)
第二篇 建国初期以改造为侧重点的方略	(125)
一、建国初期以改造为侧重点的方略制定的依据	(127)
(一) 党对知识分子实行改造方略的由来	(128)
(二) 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和新中国革命建设的 需要是党对知识分子实行改造方略的客观 依据	(130)
(三) 广大知识分子对民族振兴的渴求和新的社会制 度的向往, 是其愿意接受改造的内在基础	(132)
二、改造的途径和方法	(134)
(一) 集中学习	(135)
(二) 思想批判运动	(138)
(三) 实践锻炼	(145)
三、对知识分子改造的历史审视	(147)
(一) 旧知识分子使用的必要前提	(147)
(二) 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意义	(149)

(三) 改造方式的简单与急躁·····	(154)
(四) 改造的泛化·····	(156)
第三篇 执政以来的培养方略·····	(171)
一、建国后实行培养方略的历史必然性·····	(173)
(一) 从政治角度看, 服务执政需要是培养方略 制定的首要出发点·····	(173)
(二) 从经济建设的角度看, 建国后经济建设的 需要是其又一出发点·····	(174)
(三) 国家政权在握为大量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 奠定了制度条件·····	(176)
二、培养的途径和方式·····	(177)
(一)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	(178)
(二) 逐步建立新型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 教育制度·····	(186)
(三)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204)
(四) 风起云涌的留学教育·····	(210)
三、培养的成就、启示与展望·····	(213)
(一) 50 余年对知识分子教育培养的成就 ·····	(213)
(二) 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培养跨世纪人才的思考 与展望·····	(223)
第四篇 服务于建设和发展的依靠方略·····	(235)
一、实行依靠方略的依据·····	(237)
(一) 对知识分子现状的正确估计是党制定依靠 方略的首要依据·····	(237)
(二) 对知识分子在建设事业中重要作用的认识 是实行依靠方略的又一依据·····	(242)
二、依靠之体现·····	(244)
(一) 给以政治上的充分信任·····	(244)

(二) 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	(264)
(三) 提高福利、生活待遇·····	(285)
三、依靠方略实施的效果·····	(298)
(一) 从思想上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298)
(二) 政治、社会地位极大提高·····	(300)
(三) 在现代化建设中作出巨大贡献·····	(301)
结 语·····	(311)
一、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知识分子方略的沿革·····	(313)
(一) 相互联结逐步递进的八字方针的科学性·····	(313)
(二) 党在争取、改造、培养知识分子过程中 发生的曲折及反思·····	(316)
二、新世纪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方略前瞻·····	(323)
(一) 新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	(323)
(二) 新世纪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新视角·····	(328)
参考文献·····	(332)
后 记·····	(338)

绪 论

中国共产党是自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惟一使中国摆脱贫困困境,实现独立富强的先进政党。

知识分子是改造和建设中国的一支重要力量。

从理论上讲,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政策,是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集中体现和理论概括,也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证明,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政策正确与否是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发挥如何的直接前提。而知识分子作用发挥得如何,又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直接相关。因此,知识分子工作,是自党创立至今不曾中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以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观为依据,客观、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考察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沿革的轨迹,寻找带有根本性的内在联系,对于找准新世纪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最佳结合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献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从容应对知识经济的挑战,顺利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意义重大。

为此,学界前辈们作出了可贵的学术贡献。但由于诸多因素局限,以往成果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分期研究较多,系统研究偏少;二是从各个侧面论析较多,全面、宏观总结概括偏少;三是纯政治学视角研究较多,社会学广角观察较少;四是以党为立足点出发研究较多,双向相互研究较少;五是从党和社会对知识分子需要研究较多,剖析知识分子内在动因较少。从上述基点出发,本书旨在以下方面着力:

第一,着力于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宏观角度,将党的知识分子方略的发展沿革脉络高度概括为八个字,即“争取”、“改造”、“培养”、“依靠”。并就争取、改造、培养、依靠在不同历史时期的

侧重和它们相互联系、互为因果、逐步递进的动态关系展开论述，力争比较全面、系统、准确地勾勒出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的全貌。

第二，着力于从社会学角度，尽可能客观、全面、理性地剖析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不因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社会职能及党对其认识的过程，从而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建立的基础更客观、更稳固，从而不再重蹈历史上失误的覆辙。

第三，着力于党与知识分子相互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客观地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理解、接受、拥护党的政策的自身内在依据，进一步找准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最佳结合点，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更加实事求是，有的放矢，与时俱进，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一、中国知识分子的界定

对知识分子的性质、范围、时段的界定是研究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基本前提。

众所周知，知识分子概念所涵盖的社会群体，是一个随着社会的分工而产生，并伴随着全社会劳动者的知识化而消亡的历史范畴。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知识分子群体也不例外。

（一）中国知识分子的由来

本书所涉及的知识分子群体，按一般历史分期跨越了近代、现代和当代。就学界目前的看法，一般认为与中国近代史（1840～1919年）同步的为第一代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史（1919～1949年）同步的为第二代知识分子，这两代知识分子虽有区别，但更多的是联系。如果说与近代史同步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可称

为近代知识分子的话,他们也大多属过渡型的,真正意义上与封建士大夫有本质区别的知识分子是与中国现代史同步的第二代知识分子,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而且与中国共产党直接发生关系的也主要是第二代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建国后的当代知识分子。

现代知识分子是由近代知识分子演变而来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前身是封建士大夫。即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来源于古代的“士”。中国古代的“士”,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随着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社会分工的完成和以农民定居为特征的奴隶制的建立,产品有了一定的剩余,从事图腾祭祀、神话解说、巫术占卜及其他仪式规范的人逐渐从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们中分离出来,成为中国历史上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最早的“知识分子”。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由于铁器的使用带来的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中国进入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争霸的群雄竞相争夺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人才”。尤其是新兴的地主阶级,更是急于网罗人才以成就霸业。于是一批专门从事著书立说,提供治国方略的“学士”和从事实际政治活动的“策士”应运而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新的“士”阶层。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宗法一体的高度集权制,再加上中国文化中重“修道”轻技艺的传统,知识分子历来作为皇权贵族的后备队而争相涌入仕途。因此,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做官,就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知识分子的“正道”。

鸦片战争的炮声将中国的历史迅速地推进了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惊醒了封建士大夫的做官梦,也粉碎了文明大国的民族自尊。以天下为己任的封建士大夫开始审视中国的历史传统和自己的知识结构。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迫使他们开始睁眼看

世界,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出发去了解西方文化,包括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相对进步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当时他们接触和认识西方文化的途径大致如下:

其一,通过外国传教士的面授和外国列强在中国所办的教会学校的教育。近代早期科技知识分子代表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邹伯奇等,就是在韦烈亚力、艾约瑟、傅兰雅等影响下成长起来的^①。较早进入中国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影响较大的还有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法国传教士孙璋、英国的传教士理雅各等^②。关于教会学校的规模,据统计,到1937年全国各类教会学校在校学生100万,其中大学生约8000人^③。

其二,通过洋务运动及后来由洋人在中国所创办的企业中的相关培训。诸如19世纪后半叶先后成立的江南制造局、安庆机器局、福州船政局、金陵机器局等等,不少近代知识分子的前驱者有的曾在此就学,有的曾为此效力。

其三,通过外出留学。这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成长的主要途径。在中国留学生运动的奠基者容闳等人的倡导下,从1872年清政府向美国派遣第一批留学生开始,到五四运动前后,我国先后共有四万多人出国留学^④。期间曾先后形成了留美、留欧、留日、留法、留苏等几次高潮。

其四,通过中国兴办的新式学校的培养。这也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主渠道。据统计,1923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124所,学生34880人。1922年,全国有中学547所,学

① 吴廷嘉:《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105页。

② 沈立新:《中外文化交流史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173页。

③ 陈元晖:《中国现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2页。

④ 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生 103385 人^①。

总之,从 19 世纪中叶的晚清末年到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封建士大夫阶层的近、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其特征为:

其一,他们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知识教育,改变了封建的单一的传统人文知识结构,产生了一批希图通过发展科学或教育来改造中国的仁人志士。中国知识分子终于找到了一条在做官之外报效祖国、建功立业的新途径。

其二,他们在资产阶级文化熏陶下,程度不同地接触过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及民主自由等思想观念的影响,产生了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叛逆,不再安于充当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卫道士。

其三,他们因通晓外语、亲历异国和从科学知识中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思维方法,使他们的认识能力和认识眼界较之封建的“士”大大拓展,使得他们对社会的观察和对治世的主张,已从封建的“士大夫”们所习惯的仅从中国历史演变中总结,发展到能够从古今中外去汲取。

当代知识分子由现代知识分子发展而来,二者最根本的区别是所受教育的性质不同。现代知识分子大多接受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或资本主义的教育,而当代知识分子大部分接受的是社会主义的教育,即便其中一部分是从旧中国过来的,也由于建国初期集中的思想改造运动和长期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实践而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二者的另一个区别是社会属性与地位不同。现代知识分子在旧中国的流向不外三条:要么依附统治者做封建官僚的后备军;要么保持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政

① 陈元晖:《中国现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4 页。

治立场,务工经商或充当自由职业的文化人,这一部分构成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主流或主体;再者就是通过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争取的主要对象和建国初期的主要改造对象的话,那么当代知识分子则是在建国后 50 多年中由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培养起来的,整体地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依靠力量之一。

(二)中国知识分子的界定

“知识分子”的概念(即英语中的 intellectual)最早出现并运用于 19 世纪 60 年代的俄国。据俄国社会学家马利的考证,该词是俄国著名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博博雷金(1836 ~ 1921 年)用来描述那些最早把德国理念哲学引进俄国的人们。它的俄文含义是指受过较好教育的脑力劳动者,包括艺术家、工程师、技术员、医生、教师、律师、科学家和作家。知识分子概念源于俄国这一事实,使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对“知识分子”词条的诠释时表述为仅指俄国知识分子。

对知识分子问题最早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理论界定的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卡·曼海姆。1929 年,以他出版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为标志,使知识分子问题作为社会学和社会学史中一个独立、自在的研究领域而被开辟。他认为知识分子是充满着乌托邦精神的,因而是永远保持思想和自我超越理念的人。即认为思维对存在的超越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多次论及知识分子问题,涉及角度多为阶级关系、